# 中国通史

### 第二十三集 两汉经学

十三经，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，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。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，包含着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榖梁传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尔雅》《孟子》等经文。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。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，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。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汉石经的经文，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。勒石刻经，树碑垂范，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。匹夫而为万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，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，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。

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。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，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，客人的名字叫刘邦。此时，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，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。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。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，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。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，骂儒生为腐儒，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，以此折辱儒生。这一次，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！

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，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《公元1465-1505》年间，彩绘绢本《孔子圣迹图》36幅。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。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，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。从这幅《汉高祀鲁》图中可以看出，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，献上太牢的厚礼。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。

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。像其他儒生一样，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，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，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。此后的三年时间，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，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。相反，他向刘邦推荐的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。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。殊不知，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。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，当皇帝以后，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。在朝堂饮酒争功，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，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。他清楚的告诉刘邦，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打天下，却能为天下的长久安尽力。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，不过，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。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。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。礼成那天，场面宏大，秩序井然，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，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。从此，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做一个摆设，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。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，正式登堂入室。

公元前195年，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，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，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，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。然而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，他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。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，刘邦即病逝，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，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。先秦时期，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，地位并不隆尊。秦统一中国后，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，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，乃至于焚书坑儒，烧毁民间的藏书。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。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，就连博士官所藏的《诗》《书》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。汉王朝初建时，百废待新，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。

多年来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，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，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汉初，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。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，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。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。刘邦在世时，整日东征西讨，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。直到他死后三年多，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。又过了六年，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，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，鼓励学术发展。同时大收典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，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，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。尤其是儒家，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，实现救济苍生，治理社稷的抱负。然而天下之大，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。

《书》即《尚书》，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。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，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。在汉代，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，即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。可是汉初时《乐》已完全消失，就连《书》都很难找寻。为保存儒家经典，东汉熹平四年（公元175）朝廷下令，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，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，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。每块石碑高一丈，宽四尺，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。碑成之日，盛况空前，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。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。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，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，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。

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堇的《伏生授经图》。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，专治《尚书》。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，他不惧危险，将一本《尚书》藏于墙壁当中，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《尚书》。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《尚书》的儒者。朝廷马上请他赴京，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，不能到京城。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，晁错学《尚书》后，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。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，既有治儒家的博士，也有治道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。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。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。在汉初，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，但在长年战乱，土地荒芜，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，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，因而占有主导地位。

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，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。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，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。在政治政策上，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，经济政策方面，鼓励农耕，轻徭薄赋。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，以德化民，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。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生息，逐步达到了富国民强。据史书记载 到汉景帝后期，国家的粮仓丰满，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。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，散钱多的无法计算。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，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。

而文景盛世中，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，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。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这样写道，秦要统一天下，实行商鞅变法，弃绝礼仪仁爱。秦的功业虽成，但是倡导功利，现在虽然是汉朝，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没改变。世人追求奢侈，竞相攀比。朝廷对此没有定制，致使人们抛弃礼义，没有廉耻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。人们做事唯利是图。针对这种现象，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。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的他的意见。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。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、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，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，英年早逝。

道家思想，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。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组织撰写的《淮南子》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，但以道家思想为主。他希望汉朝庭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，这样，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。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，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，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，独立倾向明显，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。汉景帝时，曾到伏生处学习《尚书》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。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，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，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。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。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，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。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，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，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。

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。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，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，立了塑像。汉景帝时，辕固生因为传习《诗经》被认命为博士。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。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。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，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。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，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。到汉武帝时，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。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，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，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。在统治思想上，逐渐摆脱黄老学说，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，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。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，凡是学习申不害、商鞅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学说的人，不得被推选做官。这意味着法家、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。公元前136年，汉武帝下令置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五经博士，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。一年后，窦太后去世，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。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，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。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，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，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。而普天之下，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。

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，有一个千年的传统。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，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。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，为社会做出贡献。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，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。但千百年来，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。董仲舒曾发奋闭门读书。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，但因为刻苦研究，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。董仲舒以《公羊春秋》为依据，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、五行学说结合起来，吸收法家、道家、阴阳家思想，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。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。儒学转变为经学，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，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，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。

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，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地分析。公元前134年，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，征求大道之要，治论之极。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，汉武帝连问三策，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，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。董仲舒则连答三章，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，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。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，史称《天人三策》或《举贤良对策》，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。

在《天人三策》中，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，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。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。汉武帝听取后，将不治儒学《五经》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，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，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，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，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，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。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。太学之名始于西周。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，却是始于汉武帝。也正是由此开始，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。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，从古至今，两千年来不绝于耳。汉朝将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春秋》五经确定为官学。传习《五经》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，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。到西汉末年，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，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。

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。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，却被破格提拔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。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。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，认为法不远义，和不远礼。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，向汉文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，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，开设经艺考试，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，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，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汉代，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，门派严格，传承有序。西汉初年，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《诗》的申培公、辕固生、韩婴；传习《书》的伏生；传习《礼》的高堂生；传习《易》的田何；传习《春秋》的胡毋生、董仲舒、申培公等，董仲舒则是传习《春秋》公羊学大师，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，讲授儒家经书《公羊春秋》。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，即所谓皓首穷经。这种执着的精神，朴拙的态度，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。在西汉，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。到了东汉，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，以成为世家豪族。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。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，在经济上成为豪门，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。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，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。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。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。谶与维作为神学预言，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。汉代，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，比附经义的纬书。用谶维解经，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。

不过，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。他们广泛融合，汲取各家所长，以此丰富经学，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。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，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。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，创造出阴阳灾异论，借以限制皇权，规范帝王行为。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，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。如不符合天道，天就会降下灾异，做出警示。武帝晚年，灾异频繁出现，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，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，罪己诏。

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，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。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。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《春秋》中推演出的概念。大的意思是重视、尊重，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。正如《汉书·王吉传》所说，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，九州共贯也，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论理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，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。

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，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，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。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。所谓五常即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，但是对于这些观念的论述、汉儒已十分明晰。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。两千多年来，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。绵延两千多年，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。温文尔雅，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，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，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，衣食住行中。很显然，儒者是勤俭的，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。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。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。

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，但也并非一帆风顺。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。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，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。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，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。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黄家密室，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，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。到东汉后期，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。于此同时，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，而是兼治今、古文经学，在融合中寻求发展。在东汉后期，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，他就是郑玄。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，遍注儒家经典，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。显然，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，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《易经·系辞》，天下一致而百虑，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。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，使无为变成无不为，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，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，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。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、天意、小康与大同等理论，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，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。到了现在，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。

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。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，也许司马谈错了。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。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，广泛吸取各家之长，寡要即缺乏重点。这样，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，抱残守缺。而能与时俱进，发扬光大。也正因为此 ，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，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。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，虽然有过神圣化、庸俗化的倾向，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，但是，它强烈的现实关怀，经世致用的特征，自我批判的精神，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，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。今天，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，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。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，很熟悉，如同家人，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。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，启迪着我们的智慧，规范着我们的行为。

公元前91年，汉王朝统治中心内部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，巫蛊之祸。江充素与太子刘据不和，向汉武帝进谗言说，宫中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。武帝大怒，令其彻底追查。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，这在西汉时很流行。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。这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。太子非常恐惧，他不甘心冤枉致死，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，发兵自保。汉武帝闻讯大怒，派丞相率大军讨伐。激战五日，太子兵败逃出长安，最终自杀。巫蛊之祸，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。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，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。